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3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语言·文学史·文化记忆

计璧瑞选集

计璧瑞 著

Research Library of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文学史
文化记忆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3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语言·文学史·文化记忆

计璧瑞选集

计璧瑞 著

Research Library of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语言·文学史·文化记忆：计璧瑞选集 / 计璧瑞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10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3辑）

ISBN 978-7-5360-8099-7

I. ①语… II. ①计…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
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1241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书 名 语言·文学史·文化记忆：计璧瑞选集

YUYAN WENXUE SHI WENHUA JIYI; JI BIRUI XUAN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75 2插页

字 数 285,000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3辑编委会

主 编 王列耀

编 委 张 炯 饶芃子 陆士清 陈公仲
刘登翰 杨匡汉 王列耀 方 忠
刘 俊 朱双一 许翼心 赵稀方
曹惠民 黄万华 黎湘萍 詹秀敏

出版说明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流播，也就伴随有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绽放奇葩，并由此构成一道趋异与共生的独特风景线。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疑为我们寻找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世界性坐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老中青学人，回应历经沧桑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孜孜矻矻地进行了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观察与探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汇集这一学科领域的创获，为了增进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 and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加强以汉语为载体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为了给予持续发展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学理与学术的有力支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花城出版社联手合作，决定编辑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这套“文库”，计划用大约五年的时间出版约 50 种系列图书。

“文库”拟分为四个系列：自选集系列、编选集系列、优秀专著

系列，博士论文系列。分辑出版，每辑推出8至10种。其中包括：自选集——当代著名学者选集，入选学者的代表作；编选集——已故学人的精选集，由编委会整理集纳其主要研究成果辑录成册；优秀专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专著，由编委会评选推出；博士论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由编委会遴选胜出。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将以系统性、权威性的编选形式，成就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典。其意义，一是展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学术成果；二是抢救已故学人的研究力作；三是弥补此一研究领域的空缺，以新视界做出新的开拓；四是凸显典藏性，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

“文库”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并选用了前贤及今人的不少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众多方家深表谢忱。由于时间仓促，遗珠之憾和疏漏错差定然不免，尚祈广大读者多加赐教。

花城出版社
2012年10月

自序

收入本书的是进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以来，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的相关成果，谈不上自足，更遑论丰厚。承蒙研究文库青睐，给了我一个检视自己、期待批评的机会，值得珍视；我将它视为鞭策，希望不会辜负它的厚爱。

这里的表述多集中于台湾文学独有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这也是自接触这一研究对象以来一直萦绕于心的思考重点，大致聚焦在殖民语境、现代性、语言问题、文学史论述，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记忆等方面。

对台湾文学的着力思考是从台湾的被殖民经验开始的。本书第一辑以“殖民”“现代”为焦点，讨论殖民经验给文学带来的特殊形态、文学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及意义、情感经验对殖民现代性认知的影响等，尝试理解殖民语境对文学的发生、演变和情感书写等方面的作用。

语言问题是台湾文学特殊性的重要构成之一，同时又与殖民问题相关，因为殖民的文化后果必定会体现在语言上，进而左右文学。因被殖民而陷入语言困境的台湾文化人为摆脱这困境所作的艰辛努力十分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在殖民语境中进行的。语言运动和日文写作是殖民地台湾语言问题的集中体现，这也是第二辑的论述中心。

第三辑的数篇论文以文学史的视角展开观察，围绕台湾文学史写作的变迁、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认识白先勇的文学史位置，以及国民党文艺领导人与文艺政策之关联等做出说明，其视野更多地观照两岸，将台湾文学现象放到更广大的时空脉络中，以呈现更丰富的意义。这一讨论方式还将在日后的研究中继续下去，这既有助于两岸文学彼此映照、共同丰富中国新文学史论述，更缘于如此现实：对台湾文学的理解终究无法局限于台湾。

知识生产和文化记忆等问题是当下饶有兴味的研究焦点之一。随着知识生产论述和文化记忆理论的传播，相关探讨必将走向深入。从个人粗浅的研究心得来看，如此研究理路颇为适用于处理台湾文学与文化问题，由于台湾文化记忆多重沉积的特殊状态，清理不同时段的不同记忆、考察关于台湾的知识生产状况，均对认识台湾有所助益。这也是第四辑的主要关注焦点。

本书所设专辑各有基本主题，大都集中于台湾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探讨，也收入对一些文化文本，如科考与探险文本、回忆录、日记和文化创意文本的分析，而较少文学文本的具体论述，这不能不说有所缺憾。由于篇幅的限制，计划列为第五辑的作家作品论最终没有纳入本书。个人认为，作家作品论是对研究者感受力和表现力的考验，如果说综合性的现象、史料和脉络的分析论证更强调“功夫”的话，那么作家作品论则更能显现“才情”和“文采”。究竟侧重于哪个方面，与研究者的兴趣相关，也与思维方式相关。两方面的均衡当然是更理想的状态。

各篇论文写作的时间跨度并不大，自我判断没有明显的发展纵深，但也多少存在关注点的调整和思路的延展，有一点成长感。受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在思考台湾的殖民问题时较为关注文化研究理论的应用；近年来这一思路有所调整，面对现象的心态更加平和，更乐于从现象本身寻找意义，从史料的交错组合对照中发微探源。相对恒定的是自觉恪守客观冷静的学术立场，尽可能避免意气 and 冲动。看待学问功夫的态度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也许是成熟吧。

这里的文字除少量在发表时有所删节，现在恢复以外，均保持最初发表的样态，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有些文章有待进一步完善，却因各种原因未及实现。不过无论如何，已有的工作应该没有白做。

时光飞逝，自跨进台湾文学研究之门，倏忽之间已有 20 载光阴掠过，其间有过许多蹉跎、困惑、茫然和沮丧，欣喜和愉悦倒还是比较难得的。究其根本，还是研究对象的深厚程度超出了个人把握的能力。在此特别感谢曾经支持鼓励帮助过我的两岸前辈师长和学界同侪，他们让我的些许努力有了意义，让这些书写不再孤独。

这本集子就算是驿站，昭示着继续前行的必要与可能。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殖民·现代·台湾

- 殖民地处境与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 3
- 文学书写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及其文化政治寓意 27
-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 52
- 遵从殖民者的逻辑
- 殖民时期台湾的“皇民文学” 65

第二辑 殖民语境中的语言问题与文化想象

- 理想的困境
- 析台湾话文论争兼及大陆国语运动 81
- 日据时期台湾的语言殖民和语言运动 103
- 论日据时期台湾日文写作的语言功能 129
- 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
- 在日文写作中 139

第三辑 文学史的观察

台湾文学史写作中的想象构成 157

“五四”论述的变迁

——以台湾文学史为例 171

从现代小说传统论白先勇写作 188

张道藩与国民党文艺政策 201

第四辑 意识形态·知识生产·文化记忆

冲突下的民族意识形态

——论台湾传记文本《里程碑》和《无花果》 223

关于光复初期台湾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对抗式论述 237

西方之眼

——论《看见十九世纪台湾》的知识生产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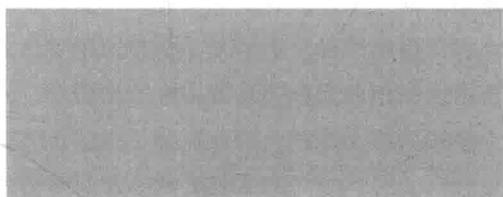
钟理和日记与创伤记忆 267

文学现场与文学记忆

——《我在我不在的地方》之文化创意分析 286

计璧瑞学术年表 299

第一辑 殖民·现代·台湾



殖民地处境与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

殖民社会与日据台湾新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显而易见而又充满复杂纠葛的问题。殖民处境下文学写作题材、主题等方面的改变仅仅是最容易观察到的表层形态，殖民社会政治、文化对被殖民者精神的压抑和渗透，对写作者身份的改变和心理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应是认识殖民社会与文学关系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划分殖民地文学与非殖民地文学的重要尺度。在全球漫长的殖民历史时期中，殖民社会、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几百年殖民统治与法国建立的非洲殖民社会不具有相同的社会形态；同一个殖民宗主国在不同地区的殖民地也有不同的统治策略。因此，在探讨殖民社会对日据台湾新文学的影响之前，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特殊性需要首先被关注。

一、日据台湾作为殖民地的特殊境遇

作为 19 世纪末叶东亚地区唯一走向帝国主义的近代国家，日本殖民者初获台湾并没有丝毫的治理经验，出于资本压力攫取殖民地的要求尚不明显。1898 年，时任台湾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曾认为日本经营殖民地具有特别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本国的利息高，使资本不易在殖民地投资”。且为维持军政，日本国内需支付大量的补助金，因而有人认为“台湾之于日本，为一‘奢侈’”，甚至“可以一

档案·史料·文化记忆
——计璧珊——选集——

亿元拿台湾卖给外国或中国”^①。李鸿章在甲午战败议和时，也列举理由，如匪乱、鸦片、恶劣的气候和生番等，说明台湾不易统治，希望日本放弃。然而战争赔款的取得^②、台湾的占据、外债的募集等，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殖民者更有信心经营殖民地。据台10年后，台湾治安状况和卫生条件大大改善，经济和金融业迅速发展，财政独立，不再需要本国政府的补助。此后的台湾开始给殖民者以丰厚的经济回报，并在以后的帝国主义扩张中，成为殖民者文化和军事侵略的重镇和跳板。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建立在严苛的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的基础之上，这本是殖民主义的本质，在台湾又有其特殊的表现形态。在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台湾自始至终存在着世界范围内罕见的严密的警察政治，“凡在台湾，不靠警察的力量，任何事情都不易实施；同时，有了警察的力量，则无事不可为”^③。无孔不入的警察政治成为剥夺台湾民众各种权利的有效手段。台湾的经济具有殖民地经济典型的单一化特征，其发展是以损害台湾广大民众利益的政策扶植日本垄断资本的过程。

① [日] 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周宪文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本书较为翔实具体地就日本据台最初30余年的社会状况，特别是经济发展作出分析。虽然出发点在于提供社会分析和总结，以利“合理”的殖民统治，但作者仍希望“‘被虐者的解放，没落者的上升，而自主独立者的和平的结合’。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时期矢内原此书在台湾被禁，他本人也因为批判日本侵占满洲问题，被逐出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本书作者简介）可见本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色彩。

② 日本从清朝索取的赔款包括战争赔款二亿两，归还辽东半岛的代价三千万两，以及上述赔款付清之前由日本占领威海卫作为保障期间的军费一百五十万两，总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没有一个外国从中国攫取如此庞大的现金的先例。[日]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③ 同①，第195页。

与警察政治一以贯之同时，殖民者在不同时期对具体的统治策略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前期的20年，采用血腥的军事行动镇压了始自1895年“台湾民主国”，终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等多次武装反抗；后期的30年，殖民当局进一步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主张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将台湾人视为日本国民，以“一视同仁，共存共荣”的口号，掩盖差别待遇。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和太平洋战场的铺开，日本加剧了对台湾的全面控制，文化上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通过“改姓名”，推广“国语家庭”和日本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将台湾彻底日本化；军事上台湾真正成为日本向南扩张的跳板，且实施“志愿兵制度”，征募台湾人加入日本军队；经济上台湾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巨大物质供给地。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日本的其他殖民地和占领地所无法比拟的。

从殖民者的立场上看，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是相当成功的，其资本主义开发较其他殖民地更为成熟，主观上为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客观上强制性地实现了台湾由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成功地阻隔了台湾与中国大陆母体的文化联系，培养了在情感上倾向于殖民者的文化力量，对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台湾本土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对被殖民者民族文

^① 这里涉及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学说，即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前者指摧毁殖民地旧的社会形态，后者指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对被殖民者而言，无论哪一种使命都可能具备有益和有害两方面因素。殖民者在疯狂掠夺殖民地财富、摧毁殖民地文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改造了落后的殖民地社会经济，引进了较为先进的教育制度、法制观念以至民主政体等（林承节：《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几点认识》，《北大史学》第3期，1996年）。日据台湾同样存在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它与台湾的特殊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日据时期乃至今日台湾社会的诸多问题，增加了认识日据台湾的复杂程度。

化的摧殘在日本對朝鮮和其他中國佔領區如“滿洲”“關東州”^①和各種租借地的統治中都未能實現，也使台灣民眾遭受的精神奴役遠比其他日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眾更加深重。

日本在華統治區有著各不相同的統治方式，但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在割讓地和租借地建立直接的軍政殖民統治機構，作為佔領區名義上和事實上的最高統治機關，對所在地人民實施公開統治，台灣的總督府以及“關東州”的都督府和隨後的關東廳和關東軍就是這樣的統治機關。一是在淪陷區，日本人在幕後扶持漢奸傀儡政權，以中國人管理中國的名義實施殖民者的實際統治，如偽“滿洲國”。在前一種直接、公開的統治中，還存在割讓地与租借地的區別。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併入日本版圖，台灣民眾成為名義上的日本國民，台灣與大陸完全隔離，傳統的文化、經濟往來被迫中斷，有關外交事務也由日本政府或台灣總督代表日本政府處理，中國在台灣的所有權益均已喪失，台灣總督成為集立法、司法、行政、軍事、外交各項權力於一身的獨裁者；而“關東州”和膠州灣雖被日本視作其海外領地，但所在的整個東北和山東地區仍處於中國政府管轄之下，佔領區與周邊的經濟、文化和民間往來從未間斷，關東廳和青島民政署^②也沒有獨立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它們同台灣總督府相比，是低一級的殖民統治機構。^③即便是日本資深政治家也並不認為租借地在主權上等同於割讓地。伊藤博文就日本軍政部門在獲得關東州後急劇膨脹的統治欲望，如兒玉源太郎^④提出的“經營滿洲”“將滿洲主權委於一人之手”“重新組織起指揮一切的官衙”等駁斥道：“兒玉總參謀長等人似乎完全誤解了日本在滿洲的地位。”“日本在滿洲

①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佔領了原俄國租借的旅順、大連地區，繼承了俄國的租借權，改稱關東州，地理上屬於滿洲的一部分，即南滿地區。

② 青島民政署為1917年後日本殖民者在膠州灣的最高行政機關。

③ 參見張洪祥主編：《近代日本在中國的殖民統治》“緒論·日本侵華與殖民統治的特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兒玉源太郎1898年4月至1906年3月曾任第4任台灣總督。